

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科学化过程*

肖 斌 张晓慧

【内容提要】 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之一是把知识传统上升为科学知识，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科学化的必由之路。欧亚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空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其发展的高度必将由知识的科学化程度所决定。有鉴于此，本文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脉络出发，分析了空间关系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阐述了欧亚多文明背景下知识传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深入讨论了科学研究方法在提升知识传统中的关键作用。本文回顾了欧亚区域复杂的空间关系及其对区域内国家政治、文化、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多样的知识传统通常源于多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反复融合与地理环境的塑造。因此，科学研究需培养逻辑、理论和创新思维三大能力，从而提升问题意识，注重构建理论框架。本文探讨了理论构建如何揭示区域内普遍性与独特性并存的现象，在研究设计部分详细阐述了科学实践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案例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同时还分析了多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包括实验法、调查研究和非介入性研究，并结合俄罗斯外交决策模式、欧亚地区多边主义等实例，展示了理论建构和验证过程中的多维视角。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科学化是认识、理论与实践不断升华的过程，是区域国别研究取得科学进步的基础。随着科学方法的普及和多学科融合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必将取得更为显著的发展，最终为区域内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系统性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欧亚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 知识传统 科学研究方法 知识科学化

【作者简介】 肖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29）资助。

引言：从空间关系出发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区域与国别是互动关系，特定的地区性影响区域内国家的内政外交，而区域内国家的内政外交又是特定地区性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一种空间关系。作为科学概念，区域学来源于地理学。地理学家威廉·邦奇认为，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科学方法论之一^①。为了追求普遍规律，区域地理学往往忽视区域的独特性，沉浸于追求普遍规律，这对巩固区域地理学的科学地位贡献巨大。但是，当把人类活动与区域地理一起考虑时，就会发现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并为以地理环境为导向的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实际上，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开始讨论人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关系，并逐渐在 19 世纪发展出了人类地理学，即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综合^②，并延续至今，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脉络。

人类活动受空间关系的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每次大发展对全球不同区域也都有影响。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而当环境不能承载过剩的人口时，便出现了人口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发生融合^③。例如，高加索人、蒙古人的飞速增长为今天欧亚地区的多样文明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文明是研究欧亚区域国别问题的重要源泉。在已知的古文明中，古埃及、古西亚文明（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中国等文明都对整个欧亚区域产生了影响。在各种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知识传统，包括制度、文化、语言、宗教，等等。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因等级制度的出现，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即从应然平等转变成实然平等^④。

① [美] 威廉·邦奇：《理论地理学》，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4~25 页。

②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0~162 页。

③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100 页。

④ 关于自然平等和实然平等的原因，可参见 [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欧亚区域的知识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历史长河中，文明都是在压力下发展的，这种压力有可能源自内部（持续衰落），也有可能来自外部（入侵）。欧亚大草原的印欧人、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是农业文明的主要外部威胁。游牧部落也是一种文化群体，因在集体行动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它在应对危机和发起战争上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时间优势。在与农业文明的战争中，游牧文明时常能赢得胜利，但很快又转化成新的农业文明。在欧亚地区历史上，大量游牧部落曾从不同方向汇集到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以西，这里水草极为肥美，可以解决游牧部落人口日益增加和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于是，有些游牧部落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而另一些游牧部落则从别处迁徙到阿尔泰山脉以西，填补空白。不同游牧部落相遇时，也会为争夺更多的资源发生战争。蒙古人在 13 世纪控制了欧亚地区，并对欧亚地区的知识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蒙古人控制欧亚地区之前，东斯拉夫人已经有十多个部落活跃在从黑海、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穿越乌克兰，北达诺夫哥罗德，东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到公元 9 世纪，农业文明已在东斯拉夫人活跃的地区确立下来^①。蒙古人统治欧亚地区时期，更多的是通过控制罗斯诸王公来统治斯拉夫各公国。伊凡三世成为莫斯科大公后，蒙古人在欧亚地区的优势逐渐消失，而到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不仅把领土扩张到东部，消除了蒙古人的威胁，并使北高加索一些部族归顺俄罗斯，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沙皇专制体制，确立了俄罗斯在东正教世界的领袖地位，并成为“第三罗马”的实践者。尽管俄罗斯在对外战略中总是探索与国际体系建立起某种关系，而且希望保持俄罗斯的特殊性^②，但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始终跌宕起伏。从莫斯科大公国至今，俄罗斯是欧亚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俄罗斯在欧洲国家眼中通常被视为外部威胁和非主流力量，俄罗斯也无法完全融入亚洲社会，成为一个经常与国际体系发生冲突的欧亚地区大国。

欧亚地区的空间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俄罗斯通过北方战争、俄土战争、征服中亚之战等，控制了欧亚地区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亚地区秩序

①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 页。

② [美] 罗伯特·A. 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5 ~ 156 页。

形成了某种定式，总是会有外部力量向俄罗斯发起挑战，“大博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不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地区两端的空间关系变化剧烈，中间相对稳定，结果是欧洲、东亚地区秩序都发生了变化。雅尔塔体系形成后，欧亚地区空间关系在最初的十几年相对稳定。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欧亚地区空间关系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空间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分化组合，北约东扩、全球反恐战争、俄格冲突、克里米亚危机等，都冲击了欧亚地区的空间关系，其影响持续不断地外溢。

欧亚区域多文明共存的历史遗产没有改变，但是空间关系处在不断发展中，这对我们研究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遵循传统的同时，我们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去发展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从而满足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需要。针对欧亚区域国别空间关系变化这一背景，本文重点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推动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科学化。

一 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研究殊途同归，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是与研究者的目标紧密相连的，研究者需要把常识转变成科学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都掩盖在平淡无奇的知识中，这需要研究者拥有三个基本的能力去发现并挖掘。

首先，需要把经验建立在唯物经验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之上。哲学家培根首先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试图通过分析和确定科学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方式，给予新科学运动以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培根用有趣的比喻来区别三种不同的科学方法，即蚂蚁的方法、蜘蛛的方法和蜜蜂的方法。蚂蚁的方法只是收集资料、证据，将其堆积起来。蜘蛛的方法是只吐出也就是制造出理论，就如吐丝那样。蚂蚁的方法不产生理论，蜘蛛的方法产生理论，但不管证据。而蜜蜂的方法则既收集资料，又用观念改造自然。培根认为，蚂蚁和蜘蛛的方法不正确，蜜蜂的方法是正确的^①。例如，保罗·罗宾逊的《俄罗斯保守主义》^②能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从19世纪初至今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

^① [英] 劳伦斯·乔纳森·柯恩：《培根传统·真理近似度·自然规律近似度》，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3年第4期。

^② Paul Robinson, *Russian Conservatism*,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9.

的历史演变，并由此可以解释俄罗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内政及外交。理查德·福尔茨的《丝绸之路的宗教》^① 则可以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发展，并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宗教信仰在中亚地区的交融共存，以及中亚如何改变了自己此前的宗教影响。

其次，需要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科学发现本质上是理性认识的自我创造。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解释而且有时还能预测实践的趋势，而且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给定的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理论来源于事实但高于事实，高于事实是因为理论排除了大多数干扰变量。所以，相信将某一理论所省略的东西列举出来就构成了对该理论的正当批评，这是对理论工作的误解^②。系统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理论。诸如在两极体系中，每个超级大国都知道，在预期另一方将保持局面紧张的情况下，它不能逃避维护和平的责任。遏制或击败攻击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利益，每一方都希望获得这种结果，并且会从中获得好处，但是达成某种结果而产生的代价也要由每一方来负担。如果多数国家都试图“免费搭便车”，那么集体利益就可能无法实现。可以看出，系统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将国际政治的整体性与某一区域的独特性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研究的解释力。

最后，要在日常观察中培养创造性思维。从知识传统寻找问题离不开对创造性思维的自我培养，但要尽量排除毫无根据的臆想。在现实研究中，欧亚地区问题研究者时常会得到这样的建议：通过阅读文献寻找问题（或再生性研究），或者参加学术会议寻找问题。这种建议看上去似乎非常有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因为阅读文献投入的时间成本巨大，但回报率非常低，很难聚焦研究主题，而通过学术会议选择问题，有可能亦步亦趋或问题过时。因此，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是发现问题的关键一步。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是有差别的，没有捷径可以选择，但努力做好以下工作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要对自己主要研究领域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特别是那些既有文献研究最为充分的国家。这有助于研究者避免做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工作^③。例

^① R. 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Premodern Patterns of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nd edition, 2010.

^② [美] 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③ [美] 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陈子恪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 页。

如，通过阅读欧盟、东盟等地区成熟的学术文献，可以了解不同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经验，而这项工作可以提高研究者观察欧亚地区各种多边主义的取向及模式。

总之，掌握了上述三种能力有助于研究者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从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中发现问题的有效路径。如果不愿做这些基本工作，那么很难发现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 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在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中进行理论构建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理论构建本身存在较大难度。社会科学中的理论通常是指那些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科学哲学划分的标准是可证伪，即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①。规律与理论的区别是，规律可以通过归纳的方法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②。在实践中，欧亚地区知识传统通常与传统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并造就了欧亚地区知识传统的多样性，继而提高了理论构建的难度。例如，中亚地区传统社会结构依据生活方式通常有三大类型，即传统的游牧民族、半农半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则根植于不同的传统社会并相互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差异性。因此，研究者很难仅从游牧民族入手，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能解释欧亚地区社会结构的理论。

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多样性并不是我们在研究中回避理论构建的理由。相反，加强理论构建是从事欧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因为理论研究可以把既有研究关联起来，通过田野或文本分析搜集的数据建立起分析模型，并向他人解释我们研究发现的意義。理论供给不足，会增加研究者在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盲目性，从而增加研究成本。

当研究者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理论构建的关键就是做好研究设计。研究

^① [英] 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②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设计要求研究者围绕所研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并展现出要收集、构建的数据和案例，以使它们能对研究者所确定的问题进行论述^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伊斯兰运动的政治化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凯瑟琳·科林斯的《思想、网络和伊斯兰运动：来自中亚和高加索的证据》是发表在国际知名政治学季刊《世界政治》上的实证文章。在文章中，科林斯设计的问题是：（1）伊斯兰组织社会动员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2）伊斯兰思想在其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文献分析，科林斯发现区域国别专家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中寻找变量，而政治学研究者更倾向于从伊斯兰运动的行动策略中寻找答案。此外，科林斯还发现，大多数研究伊斯兰运动的文献更关注中东地区。然而，更大的伊斯兰世界是在中东地区以外。因此，了解伊斯兰运动需要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去研究。于是，科林斯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运动作为研究问题，并提出了三个假设：一是在世俗威权主义和社会政治不确定的条件下伊斯兰运动会作为一种强大思想出现；二是伊斯兰组织提出的主张是地方性的，即符合目标人群和属地社会需要；三是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社交网络对于组织发展至关重要。上述假设可能是伊斯兰运动社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变量^②。在这项研究中，科林斯选择了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时间截面选择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考察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三个伊斯兰运动组织，以此检验假设。凯瑟琳·科林斯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一）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要符合基本学术规范

在确立一个问题后，研究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要做好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前人对某一特定主题的拓展。好的文献综述要实现三个目标：确立自己的研究位置及学术贡献，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为结论提供背景资料。例如，研究者分析当代哈萨克斯坦人的婚姻观，需要先厘清历史传统，包括“安明格尔”制度、

^① [英] 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版），景跃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8 页。

^② Kathleen Collins: “Ideas, Networks, and Islamist Movements: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World Politics*, Vol. 60, No. 1, 2007, pp. 64 – 96.

外婚制度、买卖制度等^①，但是这些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2019年），哈萨克斯坦是全球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有研究者利用数字技术来分析哈萨克人婚姻变化的原因，并得出以下结论：哈萨克斯坦离婚率高通常受早婚、家庭暴力和父母容忍度高低的影响，而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不会增加哈萨克斯坦社会离婚率和随意的性行为。在地域上，离婚率有明显的差异，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城市离婚率更高，诸如巴甫洛达尔、库斯塔奈、阿斯塔纳、阿拉木图，而南部地区的克孜勒奥尔达、奇姆肯特离婚率最低。北部地区离婚率高的主要是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人，他们的婚姻观与哈萨克斯坦历史传统有所不同^②。可见，通过文献综述能够让研究者更加聚焦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避免盲目性。

2. 研究路径的选择。研究路径选择至少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理论工具及其适用性，二是研究方法。与国际问题研究一样，欧亚区域问题研究的理论工具大都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选择理论工具是为解释资料提供模型，为概念和变量搭建框架，把既有研究关联起来，解释发现的意义。例如，在欧亚区域问题研究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研究者选择行为主义作为理论工具。行为主义最突出的优势是它能与很多学科交叉应用，并在群体决策、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等议题上实现理论创新^③。借助行为主义理论，有研究者在研究上海合作组织时提出，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及行为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短期自我利益的行为模式，在重要利益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时，它们通过建构上合组织内部的集体身份，强化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行为模式^④。无独有偶，有研究者借助行为主义的认知理论，分析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对

① 吴宏伟主编：《新丝路与中亚：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6页。

② Jasmin Dall' Agnola and Hélène Thibault, "Online Temptations: Divorce and Extramarital Affairs in Kazakhstan", *Religions*, Vol. 12, No. 8, 2021, pp. 2 - 20.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637页。

④ 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109页。

西方国家的政策，认为身份与认知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分歧的源头^①。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社会学理论解释了欧亚地区出现新冷战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向新保守主义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东正教的民族主义和苏联模式遗产。尽管如此，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不是文明差异，而是关于欧洲现代性的不同认识^②。

（二）选择符合研究议题的研究方法

针对欧亚地区知识传统的特点，实验法、调查研究、非介入性研究、评估研究等是常见的研究方法。

1. 实验法适合于范围有限、概念与假设明确的议题，并常用于自然科学、心理学、考古学等领域。例如，一项研究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个南高加索国家首都 31 ~ 37 岁人群的体育经历作为比较样本来考察体育参与度，以环境和个人经历作为指标。研究表明，16 岁之后的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体育参与度的不同，而家庭文化是影响体育参与度的关键和持久要素。此外，苏联时期的数据也表明，族群或民族文化的影响要先于国家制度^③。

2. 调查研究适用于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的研究，通常以个体为研究单位。选择邮寄问卷、亲身访问和在线调查等收集资料是一种古老的研究方法^④。在使用大量田野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布鲁西娜完成了《中亚的斯拉夫人》。这本书描述了苏联时期生活在中亚的斯拉夫人，对了解斯拉夫人融入中亚社会、民族关系、传统风俗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⑤。而《“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在方法上也属于调查研究。作者将俄罗斯黑土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对象，并把“俄罗斯心灵”作为俄罗斯的群体性格放在文化与

① 姜毅：《保守主义与“修正主义”——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西方国家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 期。

② Mikhail Maslovskiy, “Russia Against Europe: A Clash of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2, No. 4, 2019, pp. 533 – 547.

③ Diane Birchwood, Ken Roberts, Gary Pollock,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Sport Participation Rates among Young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South Caucasus”,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Vol. 14, No. 3, 2008, pp. 283 – 298.

④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5 页。

⑤ [俄] 奥·伊·布鲁西娜：《中亚的斯拉夫人》，高永久等译，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社会变迁之下来考察其变化历程^①。而《不安的遗产：1925~1991年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电影》则通过追溯哈萨克斯坦电影发展历史，向公众揭示了作为苏联文化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电影是如何从概念快速发展的，而发展历程又是如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互动的^②。

3. 非介入性研究是一种在不影响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研究社会行为的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法、既有统计资料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特别适合于分析文本中的国家特征、政治取向、政治发展等。例如，研究者通过帝国理论分析了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的特点，指出多法域性是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核心概念，并解释了运用此概念的优势^③。既有统计资料分析法通常是选择官方或者准官方统计资料从事研究。欧亚区域国别研究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给出了部分答案，这篇文章借助中国知网（CNKI）统计数据分析了1992~2018年间中国中亚研究成果，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中亚研究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④。历史比较分析法是在时代（或社会）变化中以及跨文化比较中发现规律，常运用于社会阶层、制度变迁、宗教和社会运动等议题。在《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中，作者通过纵向分析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梳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曲折过程，揭示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缔结联盟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等问题^⑤。

4. 评估研究就是判定特定社会干预或者措施的结果，即对确定预期结果是否出现的研究过程，主要形式包括需求评估、成本—收益研究、检测研究^⑥。评估研究的议题非常广泛，几乎所有介入到当前区域国别问题中的事件都可以进行

① 马强：《“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 Peter Rollberg, *The Cinema of Soviet Kazakhstan 1925-1991: An Uneasy Legacy*, Lexington Books, 2021.

③ 阎德学：《帝国理论视域下日本的斯拉夫—欧亚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努力方向》，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

⑤ [美] 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⑥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第348~349页。

研究。例如，当数字经济被认识到是国家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想从“数字红利”中获益，于是数字经济合作便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新内容之一。如何推动多边机制下的数字经济合作，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挑战，需要对合作要素活跃水平进行评估。通过对成员国资源禀赋（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评估，作者提出需要从五个方面改善合作要素，包括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增加合作红利；降低“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的负面影响；改善政策环境和形成“上合数字经济共同体”合力等^①。

（三）要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②

尽管不同研究议题的学术论文和报告的形式不完全一致，但通常都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问题的提出、相关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研究方法、结果（实验观察或理论研究结果）、结论（通过自己研究结果得到，但要合乎逻辑，不能夸大）、讨论（主要是阐明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为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即当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作出完全相同的预测时，越简单的理论越好^③。从目前欧亚区域国别研究现状来看，符合科学研究标准体裁、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观点前置，并用大量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规避证据的偶然性）来提高自己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此类学术论文和报告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逻辑不能自洽、无法证伪的问题极为突出。恩格斯指出，“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④。我们需要知道，科学知识不仅是概括性的（不是大量个别资料的堆砌，而是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是证明性的（不

^① 肖斌：《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前景——基于成员国禀赋效应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② 奥卡姆剃刀法则意为“简约法则”，换言之，如果关于同一个问题有许多种理论，每一种都能作出同样准确的预言，那么应该挑选其中使用假定最少的。尽管越复杂的方法通常能作出越好的预言，但是在不考虑预言能力（即结果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假设越少越好。

^③ M. Pacer and Tania Lombrozo: “Ockham’s Razor Cuts to the Root: Simplicity in Caus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6, No. 12, 2017, pp. 1761 – 1780.

^④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8 页。

是主观臆断的)。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成分,在搜集研究证据时,不仅要自觉地运用逻辑推理,还要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例如,近年来一些地理学研究者把研究兴趣投向了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但是由于对社会经济政治等要素的逻辑推理不足,又缺少必要的欧亚区域国别基础知识做检验,致使一些研究结论无法得到长期从事欧亚区域国别研究者的普遍认可^①。

三 知识传统科学化的案例检验

科学知识来源于人类实践需要,并指导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科学化过程必须通过科学实践去检验和拓展,最后才能得到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对于欧亚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即便某些知识传统形成了科学知识,但是这种科学知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并有可能改变既有的科学知识。例如,父权制是中亚国家家庭的特征,并对中亚国家社会结构有较大影响。但是1917年以后,斯拉夫文化和苏联政治文化削弱了父权制对中亚家庭的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因此,需要用发展的态度去认识父权制及其对当代中亚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随着数字社交媒体的发展、女权运动、社会对同性恋包容等,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也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女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在俄罗斯数字空间中,男性依然是垄断者^②。正是因为有很多影响欧亚社会发展因素的存在,我们需要始终发展新理论或对旧理论进行修订,从而不断推进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科学化。

在科学化过程中,案例检验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检验理论的工作。大样本统计分析和案例检验都属于观察检验。案例检验优缺点都很突出,主要缺点包括:难以控制干扰变量,有时与问题的关联性较弱;对研究者的能力有要求,特别是要运用多种搜集和整理数据的科学方法,否则将影响结论的可信度。案例检验的优势是:既可以用作理论构建也可以检验理论;可以在研究过程中修订问题设置;可以更好地描述情景数据;可以多角度和多层次地对现象进行分析;在解释

^① “乌克兰地缘环境整体向好、俄罗斯地缘位势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法国在乌克兰地缘位势升高而美国降低”。参见叶帅、胡志丁等:《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乌克兰为例》,载《地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6期。

^② Olga Andreevskikh, Marianna Muravyeva, “Doing Gender Online: Digital Spaces for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igital Russia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205–215.

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时，比大样本统计分析方法容易。在检验理论方面，案例研究有受控比较、相符性程序和过程追踪三种方式^①。其中，过程追踪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即通过确定自变量、因变量和干扰变量之间因果机制的方法^②。下面以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介绍几类不同研究对象的研究是如何使用过程跟踪法挖掘问题中的因果机制的。

1. 讨论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针对外交决策中的概念模式，格雷厄姆·艾利森与菲利普·泽利科合作研究了理性行为模式（简称模式 I）、组织行为模式（简称模式 II）、政府政治模式（简称模式 III）三种决策模式的解释力。作者提出因决策者选择的决策模式不同，会导致对同一外交（或国际危机）事件的解释不同，并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作为案例进行理论检验。艾利森与泽利科的理论对认识当今俄罗斯外交决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例如，决策者通过模式 I 注意到俄罗斯因常规军事力量的衰落而增强了对核武器的依赖；决策者通过模式 II 则会看到：（1）俄罗斯核武器日益糟糕的指挥与控制系统——技术与人员管理两方面的恶化，增加了这些核武器未经授权或意外发射的危险；（2）俄罗斯“流散的核武器”问题；决策者通过模式 III 需考虑的问题包括，俄罗斯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军队对俄联邦政府的忠诚度、继任领导的世界观等等^③。为分析非盟友/无战争大国如何用数字外交传播策略回应国家间竞争关系，作者把国家间竞争水平作为自变量，数字外交传播策略作为因变量，探讨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即随着国家间竞争水平的不同，大国数字外交传播策略在对抗主导型、争辩主导型和避让主导型三种类型中选择^④。为了检验这一因果机制，作者以俄罗斯数字外交为案例，追踪了 2000 ~ 2020 年俄罗斯数字外交在美俄竞争关系中的变化。

2. 讨论单元内部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差异是导致族际冲突的关键，而差

①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3 ~ 54 页。

② David Collier,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olitical Sciences and Politics*, Vol, 44, No. 4, 2011, pp. 823 - 830

③ [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50 ~ 452 页。

④ 张晓慧、肖斌：《传播策略与大国数字外交——基于美俄关系下俄罗斯数字外交的案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11 期。

异是由认识和行为双重作用产生的，并以认同—行为作为分析族际冲突的两个维度，建立了合作行为（各民族之胜利）、行为差异（被“遗弃人民”的情节）、认同差异（民族志浪漫主义）和冲突行为（炙热的精神与历史中的行动）四种状态。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作者以车臣问题为案例，追踪了车臣地区的冲突、叛乱、政变与暴动的原因^①。针对美国中亚政策决策过程研究较弱的问题，作者借助猎鹿博弈模型分析了该政策的生成过程，提出在风险与互利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美国中亚政策在互利占优均衡中更倾向于在中亚地区选择寻求美国战略利益最大化，而在风险占优均衡中更倾向于在中亚地区选择寻求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检验上述理论因果关系，作者跟踪了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变化及其决策过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都在案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②。

3. 讨论地区层次的问题。作为国际体系的子系统，欧亚地区秩序模式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研究者称其为“套娃模式”，即全球、地区和国际三层组成。全球层面是最外层，指俄美在全球层面的竞合关系；地区层面是中间层，指俄美欧亚地区关系以及该地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关系；国家层面是最里层，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的互动模式。这三个层次相互影响并传导，若全球层面存在着竞争关系，且地区层面选择对冲或追随的互动模式，那么国家层面会出现激烈对抗。反之，就相对稳定。通过比较俄格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两次社会运动，作者使用过程追踪法检验了自己的理论^③。随着大国关系的变化，欧亚地区出现了“灰色地带”，而美俄等大国围绕“灰色地带”展开了博弈，并出现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为了揭示欧亚地区两个阵营在“灰色地带”生成中的作用，有研究者创建了转换阵营模型来演化参与博弈各方与不同阵营的聚合行为。当参与博弈方出现挫折感时，欧亚国家会出现追随目标阵营的“转阵营行为”。研究者利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个案例，通过过程追踪法分析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与

① 李兴、姚威：《认同—行为理论框架下族群冲突模型及冲突治理——以俄罗斯车臣问题为例》，载《民族学刊》2021年第2期。

② 肖斌：《美国的中亚政策：基于猎鹿博弈视角的分析》，载《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3期。

③ 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

北约、欧盟关系，都较好地检验了转换阵营模型中的理论假设^①。近年来，随着欧亚国家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全球化与欧亚地区治理的关系问题，并提出欧亚地区存在“多重一体化”现象^②，地区性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结 语

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的科学化是一个艰巨的研究过程。就目前而言，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学界做得都非常不够。只有在欧亚区域国别研究上形成更多的科学理论，才能对该地区知识传统的事实或问题提供系统的解释或解决方案，完整地揭示欧亚地区人类活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科学知识通常由理论和经验知识两部分组成，并最终形成科学知识的完成体系。评价欧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科学标准是：可演绎和归纳，可实证、可假设。符合上述基本标准，欧亚区域国别知识传统研究将会产生诸多积极的作用，能够指导观察、帮助其他研究者解决问题或提供理论支撑、促进新旧理论相互借鉴及发展。对于从事或计划从事欧亚问题的研究者而言，欧亚区域国别研究蕴藏着丰富的素材。

总之，欧亚区域国别研究科学化过程是认识、概念、理论不断升华的过程。它要求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不断突破，从知识传统中探索一般规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科学方法的普及、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其他学科的不断发展，欧亚区域国别研究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责任编辑：张昊琦）

^① 肖斌：《“转阵营行为”与欧亚地区“灰色地带”的起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王志：《国际组织与地区治理：欧亚“多重一体化”现象研究》，载《国际论坛》2023 年第 3 期。